

兴县文史资料

政协兴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第四期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日

目



忻州三月	贾维桢 (1)
晋绥兵工第五厂简介	刘彦国 (9)
抗战时期题解同志二三事	韩兑英 刘频 (17)
记李左娥老大娘掩护红军的事迹	王如星 (23)

忻 州 三 月

兴县政协 贾维桢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长驱直进，向山西进攻。阎锡山政府把山西划分为六个行政区，晋西北为第二行政区，主任公署设在岢岚，忻州属岢岚第二行政区管辖。忻口战役后，日寇占领忻州，接着占领太原，旧政权土崩瓦解，地方秩序一片混乱，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三八年一月间我在岢岚参加了“战动总会”（简称动员会）工作。战动总会主任续范亭兼第二行政区保安司令，副主任杨集贤担任第二行政区主任（后改为专员）。在续、杨二人推荐下，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委派我任忻县县长。三月初我到忻县成立县政府，六月间，我离忻调任朔县县长。在忻任职三月有余，克服重重困难，做了不少抗日救亡工作。我去忻州时，岢岚牺盟中心区主任张国声派了四、五个牺盟干部随我到忻，开展工作，特派员为张国元，不久张调走，派来马孔智为特派员，我们始终团结一致，工作上互相帮助，视为一体，从无芥蒂。

当时忻县的情况很混乱，也很复杂。城内日本侵略者占据，建立了伪组织：维持会会长邢春喜（忻县），伪县长米子祥（忻县），城附近汉奸，伪军时出活动，勒索老百姓；距城十几里以外，溃兵、土匪到处骚扰，老百姓不得安宁。正规部队只有八路军三五九旅，布防在铁路沿线，伺机打击敌人。我初到忻，根据当时实际情

EA60/34

况，提出五点工作计划：一、建立恢复各级政权机构；二、安定地方秩序，除奸、剿匪；三、实行合理负担，筹粮筹款，支援抗日部队，供应机关、团体；四、宣传抗日救亡，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工作；五、加强各抗日力量的团结，扩大统一战线。在此三个多月内，我的工作就是按照这五点计划进行的。

我来到忻州前，因为旧的县政府跑了，新县政府没有建立，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三五九旅召集了几个地方士绅，组织了个“临时行政委员会”，办理供应事务，主任是三五九旅的一个政工干部段境，我一到忻州，段境就将经手一切向我移交。我在忻州工作期间，三五九旅王震旅长和袁任远主任对我竭力支持，赠给我自卫武器，派了一个警卫连驻在县政府所在地——寺坪，保护县政府及各机关团体的安全。另外，驻在忻崞交界楼板寨的续范亭保安六支队邢嗽天部也对我给以不少帮助。我的工作所以能够在短期内顺利地展开，和他的帮助，特别王震旅长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我在忻三个月的工作简况如下：

一、组建政府机构

县政府：县长：贾维桢；秘书：白万钟（兴县）；一科科长：刘汉臣（长治）；二科科长：芦家鼐（忻县），因芦不愿就职，改为孙念骥（兴县）；三科科长：秦育卿（长子）；审理员：刘兰亭（兴县）。科员若干人。

公安局：局长：赵安福（神池）；巡官：张××（河北）；警察二十余人。

支应局：解××、王××、均忻县，名记不清。

区、村长名记不清，均系原旧政府人员。

县政府建立，召开会议，令他们恢复原职。大部村长工作积极，而几个区长却观望不前。

二、安定地方秩序

我到忻建立县政府不久，即在寺坪召开了行政会议；原来的区村长，各机关团体全体人员均参加了会议。除号召原有区村长恢复原职，各司其事外，正式宣布：以后没有县政府的命令，任何人不得直接向村要粮、要款、要兵，区村长有权拒绝；正式抗日部队，零散驻军，机关团体持有本单位证件，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满足供应。从此，刹住了散兵，游勇的勒索骚扰之风。县政府一建立，三五九旅段境移交来两个“黑军”（因化妆夜间入室抢劫财物而得名），经过审讯，供认抢劫不讳，又经调查属实，报上级批准，执行枪决。从此，一时活动猖獗的“黑军”消声匿迹了。还有旧军队的一少部分（如骑一军、十九军……）借口动员新战士，到处抓壮丁，我派员制止，声明没有上级正式命令，任何人不得随意抓丁。经过一个来月的努力，地方秩序基本安定了，春耕才得以开始。

三、对杜文若的一场说理斗争

四月间，忻州平川正在春耕大忙季节。突然来了自称六十一军游击司令杜文若（清源），率领乌合之众二百余人，一到忻州境内，逢人就抓，见骡马就拉，要粮、要钱，不给就打。各村报告，雪片飞来，我派几路人员分赴各村，发动群众，与该部人员进行说理斗争，劝说他们不要骚扰老百姓的春耕生产，不管要粮要人，都

必须通过县政府。他们蛮不讲理，群众和工作人员硬和他们讲道理，寸步不让，经过几天的跟踪追击，杜文若一无所获，听了片面之词恼羞成怒，写信骂我，并扬言要和我手枪见面。但我认为，我们为的是安定抗日后方秩序，维护人民利益，真理在我们方面，无所畏惧，所以我决不示弱。有一天，我带了几个随从人员，亲往杜文若驻地（在忻崞交界处）谈判，路经三五九旅旅部驻地——阳湖。我对王震旅长说明我的意思，王旅长怕我吃亏，劝我不要去，我表示坚决要去，我说：“不谈问题得不到解决，仇恨会越结越深”。王旅长说：“你一定要去，我同你去”。王旅长的深情厚意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见了杜文若，我首先说明来意，把各村汇报材料和盘托出，摆事实，讲道理，坦率地批评了他的军纪很坏，扰乱地方，致使春耕生产停顿的错误行为。王旅长接着指出，县政府是抗日的县政府，是抗日军民的当家人，抗日部队都应该拥护，军民团结才能战胜敌人。杜文若倒很直爽，对我和王旅长给他提出的批评意见，表示诚恳接受，当面承认了错误，保证以后不再骚扰地方。一场风波得到圆满解决，从此以后，杜文若和县政府关系搞的还算不错。

四、筹粮筹款支援抗日部队和抗日机关团体。

我们筹集粮款的原则是根据“合理负担”精神，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纠正了以前摊派制的不合理弊端。因此当时筹集粮款困难不大。我在忻三个多月内对部队、机关、团体的供应方面从未发生任何问题。同时我派人接收了旧县政府在边山四、五个村屯集的大批贮粮（数目记不确），更觉胆壮。为了方便部队供应，在平川

北面的流江、解原，南面的三交、左磨等地设了两个流动支应站，专门负责办理供应部队有关一切事宜。当时驻军只有八路军三五九旅布防在铁路沿线，我源源不断地满足供应了他们的粮草。同时我发动群众慰劳部队，做军鞋、抬担架、运弹药做了不少支前工作，受到王震旅长和袁任远主任的赞扬。有次袁主任到县政府，我对他说：“您和王旅长对我帮助很大”。他说：“由于你对我们太好了”。体现了军民团结如鱼水的关系。

五、对“敌区工作团”不调和的斗争

忻州三月是多事的三月，我们的工作正上了轨道向前发展的时候，突然于四月间，来了个“敌区工作团”，主任杜子明（忻县），他们和县政府丝毫没有联系，悍然在上柏色村也挂起了县“政府”的牌子，县长吴俊耀（静乐，原静乐县当警察），居然向各村要粮要款，并宣称：他们“是阎司令长官委派的，是正统，是合法政府；贾县长是八路军的县长，是不合法的。”各村向我纷纷汇报。我一方面通令各村，重申寺坪会议精神，没有县政府命令拒绝供应粮款。另一方面我派人前往上柏色与“敌区工作团”进行谈判。我们的理由是：“忻县属第二行政区管辖，我们的县政府是第二行政区派来的，是合法县政府，敌区工作团作为抗日团体，我们应团结抗日，政府积极支持，但不能代替行政，更不能擅自成立县政府。“要求他们立即撤消县政府名义”。我连派人三次，谈判终无结果。在此期间他们散布流言，说什么贾县长不走，他们就用武力解决。我看到争取无效，也做到了仁至义尽，就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断然手段，派了我的武装力量，包围了上柏色，活捉了吴俊耀，彻底取

遣了这个短命的“县政府”。吴俊耀在寺坪扣押了二十余日。“敌区工作团”的杜子明奸滑狡诈，早已溜到静乐向赵承绶汇报，并转向阎锡山告状。六月初，由“敌区工作团”转来阎锡山申斥我的电报，大意是：“该县长蛮横无理，竟将我委派的县长吴俊耀扣捕，接电之日，立即释放，并将经手一切交吴接收，如有违抗，定予严惩不贷”等语。送电报的人要求释放吴俊耀，我对他说：“阎锡山官大，但他管不了我，我是受第二行政区委派的，我只能听二行政区的命令，二行政公署调我走，我才走，我走才能释放吴俊耀。”过了些时，我看到忻州已保持不住了，才释放了吴俊耀，我对他说：“苛岚调我，我走你来。苛岚如不调我，你走我在。”他只好唯唯听命。在此期间，三五九旅袁任远主任出面召开了驻忻各部队、机关、团体代表联席会议，会议上袁主任首先代表三五九旅表了态，他说：“忻县属二行政区管辖，是阎司令长官划分的，贾县长是由山西省政府委任，二行政区派来的，是合法县政府。在二行政公署没有命令调他之前，我们各部队和机关团体均应维护这个县政府，谁要侵犯它，我们八路军坚决保护。”其他各单位代表见八路军代表表了态，都跟着表示同意。“敌区工作团”和一些零星旧军代表对我虽心怀不满，也无可奈何。这次会议是王旅长和袁主任对我又一次很大的支援。

六月间，续范亭、杨集贤通知我说：忻县已划归“敌区工作团”，叫我把经手一切移交“敌区工作团”的县政府，回苛另有任用。我接到通知后，也了解到“敌区工作团”蓄谋要拦路阻劫，遂留了两个办理交代人员，带我的武装二十余人，夤夜离开寺坪，安全回到苛岚。后来听说忻县老百姓编了两句顺口溜：“吴俊耀被俘

上柏色，贾县长夜走寺坪村。”对当时忻县局势作了戏剧性的讽刺。贺老总对忻州问题很抱不平，在岢岚的一次会议上他批评山西政局说：“一个县里竟然委出两个县长，真是怪现象。”这个怪现象里，原来潜伏着很多内容呢。

我回到岢岚后，才知道阎锡山既派杨集贤为第二行政区主任，张隽轩为第四行政区主任，又不放心，因为张隽轩是共产党员，杨集贤当时紧跟续范亭，依靠八路军，表示进步。因此又派了薛文教、陈兴帮他的一伙嫡系组织了“敌区工作团”，到二、四行政区“收复失地”，他们割据了四行政区的文水、交城、清徐、阳曲，二行政区的忻县等县的部分地区，成立县政府，枪夺政权。不久阎锡山以“既成事实”为理由，把这些县公开画归“敌区工作团。”成立了八分区，薛、陈任正副专员。从此可以看出，阎锡山破坏团结抗日，进行分裂活动，蓄谋已久，早在抗日初期已露头角，晋西事变才公开暴露了他的真面目。

忻州三月是艰苦奋斗的三月，尽管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做了不少工作，各方面都走上正轨，但由于“敌区工作团”的捣乱，工作难以进一步开展。铁路东各村都来不及开展工作，五月间我同意宋词昌（第一行署主任）来信意见，把道东划归第一行政区管辖。所以我们的管辖范围只限于道西。道西又划归“敌区工作团”，忻州从此更加多事，更加走上混乱与分裂的道路。

忻州三月，我感受最深的是八路军真诚团结抗日的光辉事迹。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初，八路军击溃日寇第一次进犯晋西北，收复七个县之后，王震旅长立即率三五九旅向前推进，陈兵同蒲西线与敌展开浴血战斗（如平社战斗、石岭关战斗等），取得辉煌战果；而

山西旧军（如骑一军）却安居后方，专门制造磨擦，谁抗战、谁不抗战，这岂不是显明对照？特别在此三个多月期间，王旅长和袁主任对我无私的帮助和亲密无间的关系，至今记忆犹新，永远不能忘怀，这更加鼓舞了我追随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也奠定了我三九年彻底脱离旧政权的思想基础。

一九四六年秋，王震旅长接任吕梁军区司令员，指挥吕梁军民解放了晋西南广大地区。我在隰县见到了王司令员，受到他热情接待。他问我：“在忻州时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不是”。他说：“你作为一个党外民主人士，能够那样搞工作，真了不起啊！”这是王司令员对我的勉励，也是对我的鞭策。我决心追随共产党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一息尚存，奋斗不懈。

一九八五年五月

晋绥兵工第五厂简介

县志办公室 刘彦国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了和平谈判，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出席会议，积极为和平运筹帷幄，终于签订了和平停战协定。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了重庆和平谈判协定，举兵进攻我全国各地解放区，一时乌云密布，杀气腾腾。我军为了西北、华北解放战争的需要，将原来晋绥后勤部两个修械厂发展组建成七个兵工厂，第五厂建于兴县贺家圪台村。

一、建厂：该厂于一九四七年建厂。是由兴县贺家圪台晋绥行署纺织工具厂和兴县铁厂，又从保德县扒娄沟迁来的第二分区炸弹厂和兵工第二厂（厂址在临县张家沟光明村）之一部迁来兴县贺家圪台村，上述四个部分组建成晋绥兵工第五厂。

建厂是由边区机关决定的，一九四七年三月，由晋绥边区纺织工具厂制造厂厂长李大中传达的。

开始建厂，一二〇师贺龙师长亲临指导，对建厂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不久，军区派来了赵华清、韩津、郭有年等同志开展了紧张的筹建工作。厂址分四大部分：厂部选定在贺家圪台大地主张老八的四台砖包院，那里的宅院比较宽敞有十一眼窑洞；靠东南厢有一个大间架的木结构瓦房，作锻工车间。炼铁在刘家圪台下边的一个锥形地面，由扒娄沟人主办。翻砂、铸造车间，当时叫翻砂组选定

在村后稍的瓦窑沟坪，先后盖起了四个大工房，砌起了几眼大窑洞作烘干砂模用。机加工车间、当时叫机工组，选自名叫铺子坪的地方，砌起了两眼宏大的枕头窑洞，盖起了一间庞大的机工房，还把附近的一个姓贺的院子及油坊作了木工房，连同原来的商号“广德永”铺子的房舍也给作了厂房。火工装配车间，当时叫完成组，选定在原来的老爷庙，原有的神殿、戏台、厢房、禅堂窑不够用，另外开辟了一座土山，削平山头后挖成符合安全距离的又能相互传递半成品的操作间，在每个作业间内的地面上又挖了极深的口小底大的安全井，以防万一燃爆，再盖以轻便的屋顶，砌筑简易屋面，从对面望过去，筑成十分整齐的一个长排的小房间。在这些操作间的正南面又盖了几排房间，然后用土打成了围墙，作材料储藏间。老爷庙对面隔河的土山上挖了几孔窑洞，这里地势高是成品库房。除以上这四个建筑群外，还在贺家圪台、刘家圪台、宋家塔村等距离的交点处开了一个斜井式煤矿，这即石崖底煤矿。炼铁处也就在这个地方。贺家圪台是一个金木水火土石样样俱全、建厂条件得天独厚的地方，上级领导选定这样的地方建厂是早有打算的。村子周围有埋藏丰富、较易开采的铁矿石和煤炭，距十里外的双双山有大片的树林，可提供充足的木材。村中有日涌水量数十吨的大口径水井，这些都是建厂必不可少的条件。经过三个月时间，厂房和宿舍初步修整完毕，二分区炸弹厂、延安军工茶房工厂的一部分铸工和二厂的同志及机器设备、部分50弹、手榴弹半成品先后搬来贺家圪台。这里要特别提出为建工厂被高压电源夺去生命的米脂石工匠人×××。在安装机器设备过程中，对机电和电器的安装，工厂懂行的人不多，主要是靠兵工六厂——发电厂的技术人员帮助，其中

有日本人真岛茂树（现名李光，入中国籍）和山口吉行（改名林志明）二人，与工厂技术人员共同完成了任务。就这样五厂一面生产支援前线，一面进一步进行基本建设，完善生产条件，约到一九四七年底即完成建厂任务。全厂干部和工人日夜生产军火，为支援解放战争贡献力量。

该厂的动力由后发达村兵工六厂提供 3 3 0 0 伏交流电力。

二、工厂规模和产品：晋绥兵工第五厂全厂在编人员六百八人（其中骨干力量三百人），其余为非在编人员。

第五厂当时拥有皮带式通用车、铣、刨、磨床约二十至三十台，另有炮弹和引信专用车、铣、钻床约七十至一百台。前者大多数是从敌伪北同蒲线的铁路和煤矿修理厂缴获来的，后者是位于车家庄村的兵工第一厂自制的。工厂所用钢材主要是从北同蒲铁路拆来的道轨锻打成的；钢材是从民间收集的麻钱和钢元，经自己冶炼和轧制而成。硝化甘油炸药、雷管、甲醇、乙醚、丙酮等火工装配之原材料等由兵工第四厂、第九厂、第十二厂提供。此外，国民党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大银行发行的钞票，成了第五厂制造炮弹尾管所需之高级纸张的主要来源。

该厂的主要产品是：50毫米掷弹、筒弹60毫米、迫击炮弹、木柄手榴弹、手掷燃烧弹。两种炮弹月产量三千发左右；手榴弹月产一万发以上；燃烧弹、照明弹两项产量不大，月产约一百至二百发。所产生铁的数量，可以保证每月炮弹和手榴弹壳的铸造需要。铁矿石都是就地取材，只是由工厂出钱（晋绥边区人民币）收购。总之，从原料到成品都是工厂用土办法自己生产出来的。当时工厂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延安、解放华北和绥远，边生产，边基

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根本没有什么技术资料 and 原料器材、设计、施工单位一切都由工厂负责，争分夺秒。工人们劳动热情异常高涨，劳动纪律井然有序，当把成品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出去的时候，连贺家圪台本村人都不知道。

当时兵工职工生活待遇是供给制，和军队同样待遇。在技术人员中每月发给技术津贴六至十二元边区人民币。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根据中央兵工会议精神和军区后勤兵工部的统一标准，在军籍和军需供给标准不变的情况下，试行了分级、交叉累进计时工资制，即干部分初级、中级、高级职员三大类，每类中又分三个等级，高级职员的最后一等与中级职员的最高等级相交叉。可见当时试行此种有区别的工资（或叫津贴）制度，也是因为已经意识到平均主义供给制的弊端。

三、组织机构：当时第五厂的领导干部和组织机构是：

厂长：先后任职的有郭有年 蒋应川 陕吉太

副厂长：赵华清 蒋应川 陕吉太。

政治协理员：韩 津 刘玉成

下设两个管理股：四个生产股（车间）

总务股长：陈 琳

工务股长：陕吉太 葛玉峰

一股股长：陈耀庭

二股股长：邓全斗

三股股长：葛玉峰 吴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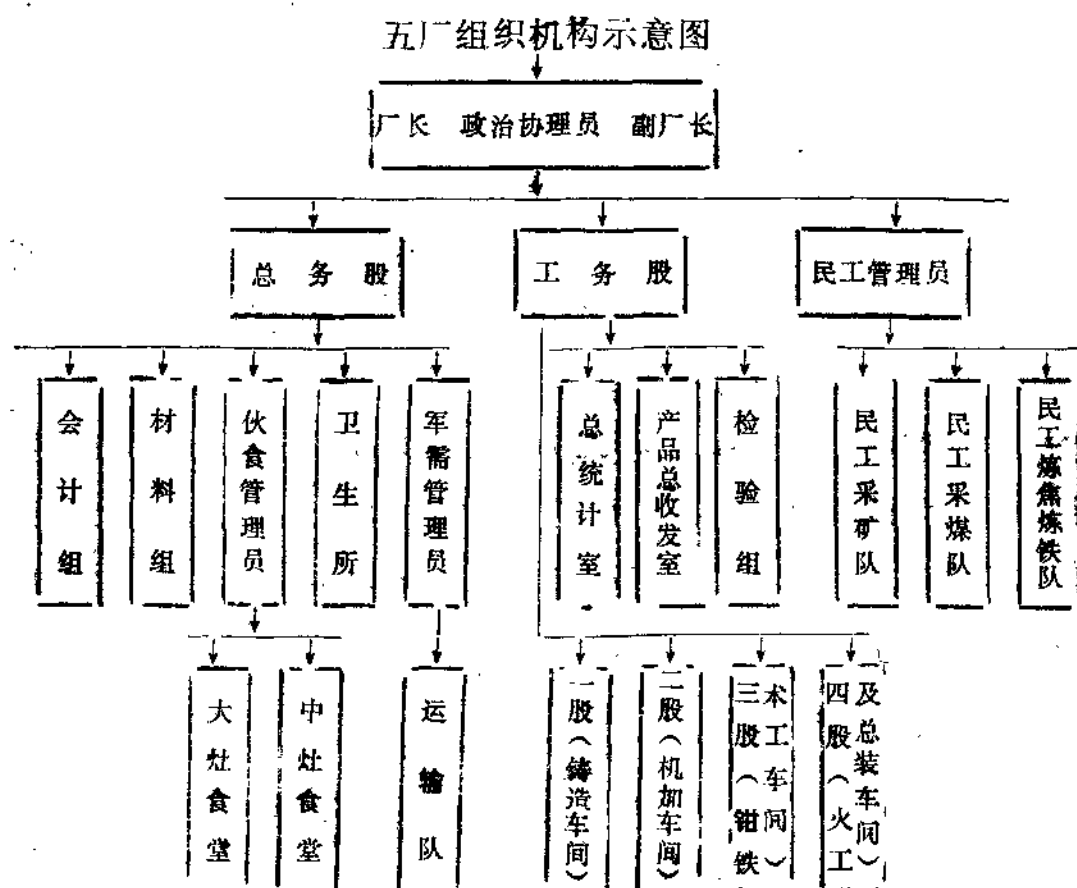
四股股长：马文启 胡占彪

伙食管理员：王启文

军需管理员：马安升

民工管理员：马文启

附：五厂组织机构示意图



四、战斗生活：晋绥兵工部第五厂存在的四个年头，正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关键的年代，也是山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抗战胜利之后拧成一股劲，忍饥挨冻，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与蒋、阎反动派进行你死我活拼搏的年代，第五厂的全体军工和民工，克服重重困难，流血流汗，日夜奋战，生产军火，支援前线。下面就仿制六〇迫击炮弹和试制燃烧弹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九四七年春，我军在西北战场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连战皆捷，缴获了大量美制六〇迫击炮弹，但苦无弹药供应，不能发挥作用。因此，兵工部首长在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命第五厂火速仿制炮弹，以济前方急需。曾在太原兵工厂工作过的郭有年厂长、陕吉太、葛玉峰股长，率领技术骨干，刻苦攻关，分解测绘美制前膛鱼形样弹，在吃透该弹机制原理的基础上，以我们当时技术条件可以制造出的简易引信，取代了较复杂的美制引信，大约前后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样弹试制就完成了。这中间的数月断续的靶场试验是在名叫杨塔上和相距约七百米的麻子塔上进行的。贺家圪台和孟家沟的群众都知道这些情况。在靶场试验阶段，一要测定精确的射程，二要亲自丈量威力半径和收集炮弹碎片，后者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实测人员要隐蔽于弹落点附近。经过一个冬天的打靶试验，才把仿美的六〇迫击炮弹圆满试制成功。并于一九四八年大量生产，运往前线。

一九四八年，兵工部首长要求试制一种温度极高的燃烧弹，四股的同志在一无资料参考，二无样弹借鉴的情况下，勇敢地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他们运用自己丰富的火工品生产知识，以氯酸钾、铝粉、铁矿粉为主要原料，经过反复试验，不断调整配方比例，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试制成功。在试验中，贺家圪台的孩子结伴遥相围观，有时也拾到一些碎片试燃，确见其威力。最后，终于试制成功了，温度高达三千多摄氏度的手掷燃烧弹。后来听说，这种独特的手掷燃烧弹，在西北战场我军擅长的近战袭击中，曾给敌人的辎重车队的很大打击。这里我们特别怀念为试制燃烧弹而失去一只左臂的许寨田同志（此人后来调到五厂煤矿场地负责），以

及在上法碾制炸药时因燃爆殒命的赵玉池同志。

一九四九年五月，西安解放后，根据西北军区（晋绥军区合并入西北军区）决定，晋绥边区兵工部所属工厂绝大部分搬迁大西北，五厂在五月完成生产任务后，即行停产拆除设备，准备往西安搬运。除留蒋应川厂长和一百多名职工在原地改为兴县工具厂外，还有部分职工复员回家。同年六月约有二百余人主要骨干力量及随军家属亦同赴临县寨子坪整编。十一月初到陕西虢镇（原国民党兵工厂），除部有年，陕吉太等主要领导干部由西北转西南外，其余绝大多数职工留虢镇训练等待分配工作。以后一部分归军队管辖，工厂在虢镇原地成立了西北军区军械部修械厂，一部分职工归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分配工作，被分配到陕、甘、宁、青、新五省区。

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在五厂拆除设备准备搬运弹药时，将一部分军火半旧成品深埋地下，当时老百姓由于不懂弹药的性能和机制原理，把这些东西从地下挖出一部分用来开炸土石，或耍弄，或打野兽，因而也有多人因失火受伤致残致死，如贺家圪台的赵问儿和张二棒的母亲即是这样。因此，当时有“到了贺家圪台不要拣拣擦擦，到了后发达不要揣揣摸摸”的说法。

另外，五厂的煤炭运输，在当时还缺乏现代化的运输工具的情况下，主要是由住在宋家塔村的战犯劳改队（其中有不少日本战犯）担任的，他们用荆条编制的筐子每天往返十余次将煤炭背运在用煤点。这批人员，经过改造有不少人成了新人。

兴县的铁矿、煤炭、小米和土豆以及兴县憨厚朴实的人民，尤其是贺家圪台周围的刘家圪台、宋家塔、兴业村、孟家沟、麦地山、艾雨头、关家崖、东坡、程家沟底、后发达、车家庄等地的老

百姓直接间接地支援了兵工五厂，这不仅是兵工战士的骄傲，也是全县人民的骄傲，应永载史册，留给兴县人民铭记五厂史实，知道兴县人民的历史功绩。